

新世纪韩国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韩] 林春城 王光东 编

新世纪韩国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韩] 林春城 编
王光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韩]林春城,王光东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309-10029-7

I. 新… II. ①林…②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韩国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韩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6110号

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林春城 王光东 编

责任编辑/孙 晶 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20 千

201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029-7/I·795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序言：呐喊在边缘

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摆脱不了韩国学术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疆域”(ideological terrain)的局限。1945年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止,由于韩国的意识形态疆域在本质上受所谓分裂社会制约的支配,因此与其他社会相比,其范围非常狭小。并且因为长期接受军事独裁的支配,所以基本上很难以触及体制的本质,学问与思想的自由也处于极度的萎缩状态。狭隘的意识形态疆域,再加上进步的研究传统的失传以及缺乏主体研究的观点,因而整体研究也随之被封锁。况且,由于1945年后又与中国大陆隔绝,因此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主要依赖于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研究主要具有以训诂学与考据学为外延的实证研究方式和与社会的非连贯性的特征,受其影响的韩国中国文学界处于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以“现代文学讲读”的名义,对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徐志摩、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局限于初步的阅读与理解水平上,研究也只限于上述作家。

韩国的中国文学界正式研究现当代文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与全国性的民主化运动一起兴起的文学运动热和“民族文学论争”,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这也引发了韩国对中国大陆文学现象的关心。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是1945年以后韩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进程所缺乏的。各领域的民主化运动,以及与此相应的劳动解放文学与民众文学,就此产生的“文学运动论”和“大中华论”等的现实理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运动史的教训中得到诸多启发。当然,对此也产生了高度关注。在这种脉络下,对于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来说,20世纪80年代就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可以这样说,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起导火索作用的文学运动

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主要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韩国所谓“社会性质论争”及“民族文学论争”等时代的土壤力量。因为那是1945年以后复原被中断的“左翼文学”传统的同时,需要填补民族文学史空白而努力的一个环节,其另一面还铺垫着对现有的中文学界未曾有过的研究价值指向,具有倾向于实证主义的批判意识。该时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集体研究的倾向。于1989年和1990年分别举行了“革命文学论争”和“文艺大众化论争”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就是最具代表的例子,此后又延续到“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研讨会。同时积极展开各大校园或校园间的共同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研究生院课程的空白,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重点,同时把哲学、美学、历史、艺术论等作为辅助而广泛地进行理论研习。倾向于集体研究和发表文学理论及文学运动论的研究风气,可以说是年轻的学者们要参与20世纪80年代韩国文学运动时代趋势的意志反映。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的营养基础上,进行得更加开放、更加多样化,研究对象扩大了。不仅如此,引进“东亚”视角、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对“写作”的苦恼、多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等。对各个研究主题的认真探索展现了韩国独立自主的研究作风,并且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结合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主要潮流。

总结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可以把70年代为止设定为前史,80年代为开拓期,90年代为发展期,21世纪为多样化时期。观其研究主体的变化,80年代以前开始进行的是先驱者的开拓工作,80年代后期正式开始的是第一代研究者在扩展“意识形态疆域”的研究工作,以90年代开始学习多种研究方法论,充满活力地开展研究工作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在“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维度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那么,纵览21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潮流并将其与课题联系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努力要确立主体的视角。我们不仅要超越给予我们巨大磁力的台湾“右倾”研究风气,还要克服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很大的中国大陆先前的“左倾”风潮。如果可以把只有韩国人才能具有的研究视角概括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韩国学派”的话,就可以充分包含中国和韩国的研究动向,以韩国的主体意识及东亚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二,在“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维度上重点主题的设定。这种主题

延续到初期的年末研讨会与次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辑。90年代也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艺大众化论特集”(第5号,1991)、“鲁迅诞生110周年纪念特集”(第6号,1992)、“台湾现当代文学特集”(第7号,1993)、“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研究特集”(第8号,1994)、“新时期特集”(第9号,1995)、“鲁迅与东亚近代”(第17号,1999)等。进入21世纪以来有“鲁迅特集”(第22号,2002)、“鲁迅特集2”(第23号,2002)、“东亚大众文化交流”(第30号,2004)、“观中国电影的复数视线”(第32号,2005)、“台湾文学特集(第34号,2005)、“中国现代文学动向与展望”(第37号,2006)、“‘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与艺术”(第38号,2006)、“中国现代性与语言意识”(第39号,2006)、“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象征体系研究”(第44号,2008)、“通过作品解读历史空间与城市空间:《兄弟》与《上海宝贝》”(第45号,2008)、“中国青年文化90年”(第49号,2009)。虽然最近研讨会的策划变得松散,与其有关联的特集也减少了,但是“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研讨会和《中国现代文学》特集无疑是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式。

第三,研究时期和范围的扩张。20世纪只在“现代文学”层面进行的研究,到了21世纪扩大至所谓的“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方面。包括初期对鲁迅的关注、对王国维和梁启超重新评价等,对新时期的论争及对作家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近代文学中进行了《点石斋画报》和《申报》等媒体研究,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扩张到第五代与第六代的电影研究。有必要指出,由于近代与当代的时间扩张及媒体、电影等范围的扩大,其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有些忽略的方面。

第四,鲁迅研究。很多研究者在同一时期对鲁迅开始关注,这是与80年代韩国现实中触发的问题意识,以及要将其与文学研究统一起来的苦恼有其内在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族危机状况中,能把尖锐的现实问题消化或解决在文学空间里的鲁迅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及其超越自己的时代而取得的艺术性成果,并且对历史与人所具有的洞察力,对于要克服80年代的制约和开启新的研究领域的韩国研究者来说,重新成为研究对象。21世纪韩国的鲁迅研究跨越中国文学,在东亚文学的维度上进行与韩国作家的比较研究。

第五,多种研究方法论的尝试。研究者的主体视角的确立与对现实问题意识的文学性解读,使研究者们具有了对新的研究方法论的渴望与探索。

尝试了思潮流派论和系统论以及女性主义和多种后主义(postism)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结合,最近有的研究还尝试了导入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论进行“文学人类学”研究。

第六,与“文化研究”结合。21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最大话题可以说是与“文化研究”结合。与“文化研究”结合,一方面把文学作品以外的文本,特别是把电影和都市文化等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接受了研究方法论上的跨学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并不否定文学研究。这超越了以前只埋头于作品分析的文学研究,更关注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并进行对文本的探索。特别是对考察文本的生产和接受等机制方面是很有实效的。

最后,可以说,研究成果的专著及刊物出现了增加趋势。首先,可将“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编辑的学会丛书作为一个范例。例如,把中国现代诗与现代性的问题联系起来的论文和现代诗论;对现代诗流派的研究;其他作家作品及台湾现代诗的论文组成的《中国现代诗与诗论》(1994);对鲁迅的思想文学的现存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反映最近的问题意识的论文集《鲁迅的文学与思想》(1996);除了鲁迅,对十三位代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家与作品进行探讨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世界》(1997)。到了2004年,对韩国人来说,中国已不是“选择”而是“必须”接受的巨大的文本,在此认识下,对现当代中国的深层次的大众的理解为目的,策划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系列。其中,《与中国现代文学相见》(2006)由三部组成。第一部是每个时期,每个地方的文学史论,第二部是体裁论,第三部是作家论。最后在“尾声”里把西欧的现代作为参照体系,检验了“东亚的现当代”的可能性。这个系列还包括《通过电影读中国》(2006)和《中国电影的理解》(2008)。

在学会丛书以外的著作中,最显眼的现象是文学史类著作的出版。例如,对现代文学的主要项目采取词典式的叙述方式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1991);立足于只叙述事实不做评论的“述而不评”精神的韩国首部正式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1992);作为中国文学史三部分之一而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新世纪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09)展示了“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从19世纪末“到过去整个20世纪都包括在内,并且还要涉及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学的变化和发展”。网罗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进行说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辞典》(1996),可以说是文学史类的补充物。最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文

学史话语和他者化》(2013)把这个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在话语(discourse)与他者化(othernization)的观点上,分为“理论”、“专题”、“热点”进行了探讨。

还有把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单行本和其他著作。较早把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为单行本的有:《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1997);《中国抗战期现实主义文学论争研究》(1998);《文与小说(novel)的结婚:近代中国的小说理论重编》(2002);《解读近代中国的文学思维》(2004);《郭沫若与中国的近代》(2009)等。这期间积累的研究成果已出版的还有:在一般研究者对现代诗几乎没有关注的背景下所撰写的有关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现代诗的研究论文集《中国现代诗研究》(1992);研究五四以后到80年代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以及通过这些小说看到的中国现代史的阴暗面,并反映了作者试图通过小说与大众交流的《透过小说看现代中国》(1995);基于长期以来对韩国国文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眺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1996);古典诗歌研究成果延伸到现当代诗的论文集《中国现代诗的理解》(1997);以及《郁达夫沈从文小说研究》(1999)。进入21世纪以来出版的研究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意识形态》(2001);《精神界的战士鲁迅》(2003);《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2003);《以东亚视觉看中国文学》(2004);《高行健与中国当代小说》(2005);《中国现代小说的探索研究》(2005);《中国现代文学的近代性重新认识》(2005);《鲁迅的文化思想与外国文学》(2005);《“脱离”现代与东方式思维逻辑——寻找东方的〈眼睛〉》(2008);《鲁迅式革命与近代中国》(2008);《华严的世界与革命——东亚的鲁迅与韩龙云》(2009);《人、生活、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度》(2009)等。

共同研究的成果有:《中国近代的风景》(2008);《冷战亚洲的文化风景 1:1940—1950年代》(2008);《冷战亚洲的文化风景 2:1960—1970年代》(2009);《东亚文化和文化的本体性》(2009);《上海电影与上海人的本体性》(2010);《上海电影:历史与解题》(2010)。还有编译书《21世纪中国的文化地图》(2009)。

上述的主要潮流也是今后持续进行的课题。

在这里介绍的文章是21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是属于现当代文学的初期,通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画报”考察了当时的青少年话语和近代都市的消费文化,

还比较了韩中言文一致运动与英美的意象主义,并且对比了三个作家凝望关东大地震的视线,以及比较了韩中初期的近代文学史叙述的特征。第二部可以说是作家、作品论。主要考察了从鲁迅到张爱玲、王蒙、金庸、余华、《丁庄梦》等。第三部是理论的探讨。主要探讨了进化话语、现代都市的小家庭的形成、东亚话语等。还对韩国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位论文和理论著作进行了相关研究,并附以书目以备参考。

俗话说“旁观者清”。因为旁观者总是跟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能看得更清楚。对中国研究有必要跟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有必要脱离中心经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韩国是处于边缘的。处于边缘就有着能够观察到处于中心却观察不到一些方面的优点。所以处于边缘的观察会促进中心的反思。

在这里,我应该对那些肯定地接受编者的意图,并欣然翻译、投稿自己文章的所有笔者深表谢意。这本书由 19 篇文章和 1 篇目录组成,通过这本书希望中国的同行们了解韩国的最近研究动向和潮流。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四日林春城识于青松斋

目 录

编者序言：呐喊在边缘	1
------------	---

现代文学起源

闵正基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解析	2
	——以中国语境中的“少年/青年”召唤为中心	
文丁珍	透过画报看近代租界与女性	17
	——以近代城市与消费文化为中心	
李宝暉	韩中言文一致运动与英美的意象主义	38
金良守	凝视“关东大地震”的三个视线	57
	——郭沫若·李箕永·中岛敦	
洪昔杓	韩中早期近代文学史叙述之特点	69
	——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作家作品论

刘世钟	华严的世界与革命	84
金河林	鲁迅的文化吸收与文化创造的思维模式	102
任佑卿	女性的时间、叙事以及国族：张爱玲《传奇》的症候阅读	113
张允瑄	话说王蒙的文学世界：不灭的热情和不断地追求	134
林春城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与金庸作品中人物的实用理性	148
尹泳洵	关于《兄弟》的现实主义及其叙事的总体性	162
	——以围绕《兄弟》的争论焦点为中心	

李琮敏	在狂欢叙事和现实主义之间 ——对余华《兄弟》的批判性思考	176
林大根	《上海宝贝》：扩展文本与重构语境	191
金顺珍	《丁庄梦》里的国家和个人	208

理论研究

李保高	进化话语解释的政治学	220
朴姿映	小家庭是怎样形成的 ——以 20—30 年代“妇女杂志”展开的有关家庭讨论为中心	234
金惠俊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在韩国 ——以 21 世纪最初 10 年为主	251
千 真	“摄像镜头”：反思中国经验和现实的洞察之眼 ——看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	296
林春城	差异之维度：通过批判性东亚话语试看东亚认同	314
编后记		330

现代文学起源

-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解析
- 透过画报看近代租界与女性
- 韩中言文一致运动与英美的意象主义
- 凝视“关东大地震”的三个视线
- 韩中早期近代文学史叙述之特点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解析*

——以中国语境中的“少年/青年”召唤为中心

闵正基（仁荷大学中国语中国学系教授）

一、绪言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梁启超在其撰写的《少年中国说(附中国少年论)》一文当中对“少年”的召唤可谓是开创了“少年/青年”召唤之先河^①,紧随其后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未来的过程中,都不约而

* 本论文是在 2009 年 5 月 16 日于韩国延世大学校召开的、以“中国‘青年文化’的 90 年”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与中国人文学会为了纪念中国五四运动 90 周年而举办了该学术会议)上笔者所发表的同一标题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补充而得来,收录于(韩国)《中国现代文学》2009 年 6 月第 49 号。当时参加会议讨论的各位学者的宝贵意见,特别是香港岭南大学罗永生教授题为《青年与现代性》的主题发表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笔者感到本论文在更加广阔的语境当中仍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于是开始着手对论文开始补充修改。罗教授的最终成稿《现代性与中国青年论述的流变》亦收录于(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第 49 号。

① 有关近代中国召唤“少年/青年”的历史,需要在之后的研究当中做进一步的调查论证。在对《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进行过一番检讨后,笔者认为至少从标题目录来讲,对于少年的呼唤的记录没有比《少年中国说》更早的文章了。或者换句话说,就算是有,考虑到梁启超的这篇《少年中国说》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笔者认为把这篇文章当中对少年的召唤看成是近代以来少年召唤的最早记录也并无不妥。在这之后,与之呼应的文章开始时不时见诸杂志报端,并且在五四运动前后,这类文章终于开始大量地出现。文章作者以“少年”或者“青年”作为自己的笔名进行创作的现象(“同是少年”,“突飞之少年”等)的时常出现可以说也是在梁启超使用“少年中国之少年”写下《少年中国说》以后的事情了。前文提到的罗永生教授在自己的论文当中也是以梁启超这篇关于“少年中国”的宣言为始展开了其分析讨论。

同地站在“少年”或“青年”的立场上^①,对向自己一样的中国社会年青一代展开了不遗余力的召唤与训诫^②。近代以前的“少年”一词与“老年”相对立,主要的意思就是“年龄小”或者“年轻人”,“青年”一词也基本与“少年”类似。值得注意的是,“少年”二字又拥有“尚未成熟”这一潜在的含义。而就在进入20世纪初以后,在陷入列强瓜分狂潮,即将分崩离析的中国,“少年/青年”又获得了全新的定义,即能够肩负起新时代所赋予的新使命的行为主体。此后,伴随着对于国家富强与对近代化的热切追求,对于“少年/青年”的召唤与训诫也一道延续了下来^③。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在构建现代中国过程当中出现的两大势力,而蒋介石与毛泽东分别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有必要、有机会时也时常会把“青年”二字挂在嘴边^④。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围绕这一概念的支配权所展开的争夺是何等激烈。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供各方角逐的“战场”。

在下文当中,笔者将会就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展开具体的分析,以图了解近代中国召唤“少年/青年”的语境、意义以及这种召唤从一开始便肩负着的使命与其所面临的必然的矛盾和困境。

① 在人们开始将“少年”一词当做对于十岁出头的“年幼者”的专门指称名词来使用以前,该词一直与“青年”不加区别地被人们当做“年轻人”来使用。而19世纪末以来,“青年”一词在有关基督教的期刊当中更加多见,这一现象大概与日本基督教团体用“青年”来指代“Christian youth”有关。“少年”和“青年”在“青年”开始被人们强调的五四时期以后仍然经常被混用,这点我们可以通过李大钊等人1920年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的学会名称以及恽代英连载于该学会机关报《少年中国》第2卷第1—3期(1920年7月15日、8月15日、9月15日)上的《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得到确认。在韩国关于作为近代概念的“青年/少年”的讨论,参见Lee Ki-hoon,《青年,近代的表述》,(韩国)《文化科学》2004年2月第39号,第208—215页。

② 梁启超以来中国关于青年的表述参见罗永生的《现代性与中国青年论述的流变》,载(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第49号。

③ 梅家玲在其论文当中从上述角度详细分析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参见梅家玲《发现少年,想像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像》,载《汉学研究》2001年6月第19卷第1期。

④ 通过类似蒋介石1929年在北京发表的《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家们是如何召唤并训导“青年”们的。

二、向着“二十世纪太平洋”展翅的“少年中国”

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

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颺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在梁启超立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吟诵而出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当中,我们能找到如上两行表述^①。变法失败后便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伴随着其参与筹备的《清议报》的发行,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接受并向国人传播着西方的思想理念。而其在二十八岁那一年(同时也是20世纪的第一年)登上前往美洲大陆的轮船后所创作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则可以直接向我们勾勒出当时不断掂度中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梁启超脑海中对于世界的认知。在梁氏的视野当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太平洋”这一无边无际的大洋。而这一大洋在以中国作为地理上的中心坐标轴来给周边海洋命名的过去,可以说并不存在于中国人的认识当中。该文中,梁启超刻意强调自己正立于东西两半球的交界线(或者换句话说,自己正横跨东西两半球)这一全新的认知。并且这样的空间感与梁启超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新旧之交的世纪之初这一事实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是一篇长短句并存的长篇诗歌,同时也是当时梁氏对于正在构想当中的“诗界革命”论^②的首次实践。在这篇诗作当中,梁氏阐述了世界文明在时间与空间的发展过程当中,其中心逐渐由河流转向内海(例如地中海、渤海等),而如今已转移到大洋这一事实,并以自己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曾为世界文明谱写了光辉篇章,却在当下变成了列强觊觎对象的“老大帝国”能够实现再次复兴的期盼给该诗画上了句号。可期盼虽然热切,具体到实践当中的话,中国究竟该如何实现复兴呢?《少年中国说》便是站在“新旧二世纪

①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写于1900年1月梁启超出发前往夏威夷的轮船上,并于1902年2月8日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被刊登。

② 梁启超对于“诗界革命”的初步构想最初产生于当时前往美洲的轮船当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梁氏此后以《夏威夷游记》为题选择并整理的游记当中得到确认。在该文当中,梁启超将对新体诗的构想自比于麦哲伦与哥伦布的航海与新大陆的发现,并且该文还体现出了世纪之交梁氏的大洋映像。

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的梁启超针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宣言与答案。

1898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的梁启超一面宣传自己的维新思想,一积极投身于对自己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西方思想的传播与介绍当中。之后,梁启超为了募集保皇会的活动经费并敦促美洲各界对其的支持,于1899年末将对美洲大陆的访问摆上了自己的日程。1899年12月19日(农历11月17日)从东京启程的梁氏于当月20日在横滨乘船,并于1900年1月中旬抵达夏威夷。而就在其意外滞留夏威夷的当口,梁启超接触到了有关中国国内危局的消息^①。因此作为梁氏应对世纪之交中国变局的一种方法与措施,创作于该时期并发表在1900年2月10日(阴历1月15日)《清议报》第35册^②上的《少年中国说(附中国少年论)》当中对“少年”的召唤所具有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

从1899年末踏上前往美洲的旅程开始算起,到第二年结束在澳洲的逗留,重新回到日本为止,梁启超大约奔忙了17个月之久。此间梁启超一直将《清议报》的发行托付给其友人麦孟华。观察这一时期梁氏的著述,我们不难发现,除去讨论国内政局及其对策的书信以外,梁氏并无新作问世,就连这一时期梁氏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比其在此前后发表的文章要少许多。究其原因,从客观角度来讲,旅途中并不具备创作评论以及学术类文章的条件,另外就算能写出来,能否将稿件正常投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除去此前一年便开始连载的《自由书》仍然继续连载了两回以外,当时梁氏通过

① 梁启超当时按照原计划本应取道夏威夷前往美洲大陆,但检疫问题的发生导致其在夏威夷滞留了长达半年之久。到达夏威夷后,在得知保守派谋议废除光绪帝以及义和团运动等中国国内时局的消息后,梁放弃前往美洲大陆,急忙重新回到了日本,但此时的北京已经被八国联军攻占。关于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主要行迹以及著作,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268页,以及李国俊编著的《梁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页。

② 关于该文究竟是梁氏何时所作这一问题,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不过根据其发表在1900年2月10日的《清议报》上这一点可以看出梁氏在之前已经完成该文的写作。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梁氏没有使用从1899年初一直在用的笔名“哀时客”(这一笔名第一次使用是在1899年2月20日发行的《清议报》第6册上发表的《爱国论》),而是宣称今后要把“少年中国之少年”作为自己笔名。鉴于梁启超在其从日本出发后的1899年12月23日发行的《清议报》第33册上发表的《国民十大元气论》是梁氏以“哀时客”的名义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少年中国说》有可能早在1899年12月中旬左右到其从日本出发前就以完成并交稿,亦有可能是其在前往夏威夷途中或到达夏威夷之后完成,并通过邮船寄回报社。根据文集的目录来看,这篇文章应写于庚子年,而从夏威夷往日本用邮船寄稿的话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由此可见,《少年中国说》最晚也应在1900年1月末便已完成。

杂志发表的散文随笔只有不过区区四篇,而《少年中国说》便是其中之一。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在梁启超心目中的分量。在刊登过《少年中国说》后,《清议报》第36册又刊载了强烈谴责任由光绪帝被废而袖手旁观的相关人士的《呵旁观者文》,而后者更加衬托出《少年中国说》当中急切的召唤所具有的特殊意义^①。

《少年中国说》在梁启超个人思想变迁的过程当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梁启超在启程前往美洲大陆前,从同年8月便开始以专栏的形式在《清议报》上连载涵盖众多主题的随笔文《饮冰室自由书》^②,关于刊登该文章的理由,梁氏在“叙言”部分就已道出其目的在于“自验其学识之进退,气力之消长”^③。可以说《自由书》作为梁启超思想上的一座丰碑,在其形式的自由当中,梁氏向我们展示了其前往日本以后思想上的转变,而该文随处可见作者对于“英雄”、“伟人”、“豪杰”的期盼和渴望。可以说《自由书》蕴含着梁启超在随后论述当中召唤“少年”的必然性。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比起其在此前后时期要更加接近自由民权论。不仅如此,当时的梁启超与辗转美洲大陆和日本宣传革命主张的孙文,以及过去在梁氏创办《时务报》时从旁协助,随后其个人主张又逐渐转向革命论的友人章太炎有着频繁的往来。这一时期的梁氏在摆脱授业恩师康有为思想的束缚,逐渐倾向于较为激进的革命论的同时,也在积极谋求与革命派合作的各种可能^④。

总而言之,将梁启超此间的思想变迁、对于更为激进的变革表示出的兴趣、对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英雄”和新的“中国魂”出现的渴望、自身的航海经历以及对“世纪/新旧”之交的认知、作为横跨东西的行为主体的自我觉醒、对中国国内危如累卵的政治局面的忧虑汇聚而成的便是他的《少年中国说》。根据文章的内容和性质来选取各式笔名的梁启超以《少年中国说》的创作为契机,抛弃了自己一直使用到1899年末的笔名“哀时客”,转而披露了自己今后要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的名义进行创作的心声。

① 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第56—65页。

② 《自由书》刊载于《清议报》第25—33册(1899年),第37、39册(1900年)以及第96—100册(1901年)。

③ 《清议报》第25册,1899年8月26日。

④ 梁启超的上述行迹一直持续到1900年3—4月之间,直到梁氏与革命派的合作因康有为的强烈反对而彻底告吹。众所周知,梁启超在回到日本后,选择了支持君主立宪制的路线,并随后通过《新民丛报》与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方展开了激烈论战。